

外国语文大家谈

编者按: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高等外语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担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传播中国声音、建设“一带一路”、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大批高质量的外语专业人才和高水平复合型涉外人才。因而,如何构建高质量的外语专业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是当下外语界同仁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鉴此,《外国语文》编辑部特邀孙有中、姜亚军、杨枫、董洪川等几位外语学者就此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现刊载于后,以飨读者。

——董洪川

新时代高校外语专业的变革与发展

孙有中¹ 姜亚军² 杨枫³ 董洪川⁴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7;2.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3.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6;4.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对我国高等外语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高校外语类专业正经历“凤凰涅槃”,其根本目标是构建中国特色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外语类专业要根据国之所需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大胆改革,从培养“外语通”转变为培养“外国通”,服务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长远目标;其次,要深化外语学科内涵建设,拓展复合型人才培养深度和广度,重构专业知识结构;第三,外语类专业要实践分类卓越、分层培养,外语学科评价体系也要实行分类评价;第四,从教育情怀、知识结构、技术能力、教学理念、教育方法等对师资队伍进行重构重组。在我国的国情下,外语教育是国之重器,外语院校大有可为,学习外语是广大青年学子的“报国之门”。

关键词:外语专业变革;中国特色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复合型人才;分类卓越;分类评价

中图分类号:H31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4-0015-10

我国的外语专业必须“凤凰涅槃”

我国的外语教育与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外语教育存在巨大的差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收稿日期:2025-06-05

作者简介:孙有中,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外语教育、跨文化传播研究。

姜亚军,男,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杨枫,男,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外语研究》主编,主要从事教育哲学与外语教学研究。

董洪川,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语教育、英美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孙有中,姜亚军,杨枫,董洪川.新时代高校外语专业的变革与发展[J].外国语文,2025(4):15-24.

第一,中国与英美等英语国家外语人才储备不同。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它们都有大量的移民人口。美国国内几乎能找到讲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移民。英国也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讲不同语言的移民。移民为英美等英语国家提供天然外语人才储备,因此它们不需要那么重视外语教育,也不需要那么多高校来专门培养外语人才。

第二,英语在全球化中的语言霸权降低了英美等英语国家对外语的依赖。英语目前是世界通用语言,英美人走到世界各国可以不使用对象国的语言,而是通过英语交流。就算这些国家的外语教育不怎么样,也不影响它们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治理、开展进出口贸易。但是中国不一样,中文还远未成为世界通用语。我们要是没有足够的英语和多语种人才,整个国家走向世界的进程就会面临严重的语言障碍。

第三,中国与英美等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国家战略对外语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和英美等英语国家存在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差。尽管可以说我们100年走了300年的道路,但是我们在很多方面的发展还是有欠缺的。甚至可以说,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正经历过度开放、过度全球化,以至于它现在想往回收缩,开始“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但是,中国还需要继续改革开放,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就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外语人才。

与英美国家外语专业的式微不同,在我国的国情下,外语教育是国之重器。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庞大的、高层次的外语人才队伍的话,中国就不可能有效参与全球治理,也不可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与英美等国的外语教育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就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英美国家的高校总体上采用市场导向的办学模式。所以英美两国在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但是大学从逐利的角度来看,其观点却可能与政府背道而驰。但中国并非如此,国家宏观规划我们向什么方向走、我们需要什么方面的人才,我们的大学就必须配合国家的战略需求,就必须提高人才培养适配度,这是新近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重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给北外老教授们回信指出:外语院校大有可为。现在关键问题是怎样大有可为?

应该说,外语类专业不是消失了,而是在经历凤凰涅槃。传统意义上的外语类专业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但与时俱进的、大胆改革的、积极创新的外语类专业方兴未艾。已经进行改革的创新的这些外语类专业,其招生、就业都不成问题。大家可以参照计算机专业的迭代升级来理解外语类专业目前的变化。在各高校的招生目录上计算机专业很少了,变成了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等。计算机专业消失了吗?不是,计算机专业凤凰涅槃了。外语类专业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变革,我们看到很多从外语类专业发展出来的专业,如涉外法治专业、国际组织专业、国际传播专业、语言与人工智能专业等。

外语类专业该如何凤凰涅槃?首先,从人才培养来看,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课程结构需要调整。外语类专业不只是学语言的专业,人才培养不能局限在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培训上,在课程中仅仅添加一点文学或语言学知识也远远不够,应当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给学生传授人文通识知识、跨学科知识。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听说读写课程改革为例,精读教材编排与人文教育深度结合。第一册按照语言与文化主题编排,选取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雅俗共赏的文章,让学生认识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第二册主题是文学与人生,让学生阅读经典的文学文本来思考人生的大问题。第三册主题是个人与社会,让学生阅读社会学的经典文章,来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第四册主题是哲学与文明,让学生读历史学、哲学经典。这样的教材把语言和人文通识教育结合,给学生打下深厚的语言和人文知识基础。这样培养的学生将来可以进入人文社会科学任何领域。

其次,外语专业要更加重视区域国别知识。过去很多学校给外语专业的学生开一门叫“英美概况”的课程,介绍英美国家的地理、人口、风俗等,这远远不够。要以把学生培养为国别通、区域通为目标,在本科阶段就给他们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包括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等。再次,外语类专业需要构建跨学科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以培养各行各业涉外人才。这与相关专业和大学英语的相加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述,外语类专业人才具有人文通识的功底、区域国别的功底,再掌握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这样的人才正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急需的高层次涉外人才,他们具有全球胜任力、高层次语言运用能力、高层次思辨能力,他们具有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可以把他们派到世界各国,让他们进入不同的领域。

所以,重新定义的外语类专业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正在经历凤凰涅槃的外语类专业需要一点时间,但这是国家战略所需,也是专业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演变,外语类专业经过创新变革后依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外国语文》编辑部安排这样的讨论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有一种全球视野来思考我国的外语类专业变革,既看到国外高校外语专业变化可供借鉴之处,又要看到彼此的差异。

关于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外语类专业要坚持分类卓越。第二,拓展复合型人才培养深度和广度。要培养“外语+”人才,加号后面的东西,即复合的对象专业要有一定的深度。如国际传播人才,需要掌握传播学的理论、融媒体技术、媒介伦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再如外语+人工智能,那就要系统开设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课程。从专业的广度来说,外语类专业过去是近亲相加,跟经济贸易、国际关系相加,现在的复合甚至可能和理工农医复合。

第三,深化外语学科内涵建设。要把外语本体做得更强,这样的复合才有意义。在传统的领域,如语言文学领域,我们也需要做得更深。还有两个新领域,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也都需要从学科内涵的意义上去深化。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搞“三进”和“理解当代中国”的课程建设呢?因为要培养融通中外的外语人才,首先得理解当代中国,掌握中国治国理政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提高国家软实力。中国走什么道路,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中国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中国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什么智慧,等等,这些都是跨文化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跨文化研究这个学科方向知识内涵的深化问题,是构建外语学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外语学科的本体必须进一步加强。坚持分类卓越、拓展复合型人才培养深度和广度、深化外语学科内涵建设,这三方面都强壮起来了,外语类专业大有可为。

孙有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语专业改革需要颠覆性思维

我国高校外语类专业的改革与发展已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对人才质量提出新要求;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带来人力资源需求的结构性变化;针对外语专业在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面临的压力,各高校都在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借本校或兄弟院校优势专业设置双学位或联合学位本科项目者有之,开设微专业者有之,减少招生数量以提升生源质量者有之,暂停招生等待观望者有之。有些院校则陆续撤销了英语、商务英语、翻译和其他语言类专业,有的甚至将外国语学院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学院。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此前很少思考的一些问题:目前的英语等专业培养的毕业生是否足以满足“国之所需”?英语专业在“英语+计算机”“英语+法律”和“英语+人工智能”等双专业或联合学位本科项目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否是外语类专业应对目前所面临挑战的最佳途径?国际传播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和区域国别人才是否应该列入外语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如果应该,如何处理外语专业和政治学类专业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030206TK)、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国际新闻与传播(050309T)以及2025年新增设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区域国别学(0502104TK)的关系?我们还要深入了解今天的英语专业为什么是目前的樣子以及我们的外语专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语类专业有什么不同等问题。

笔者发表在《外国语文》2025年第2期特稿专栏的《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的式微:思考与启示》一文的写作初衷便在于此,以期“借他山之石,琢己身之玉”。尽管我国现阶段所处历史方位与英美国家不同,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英美国家各异,但不少问题是具有共通性的。例如,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高校,外语教育在过去20多年出现两个“怪圈”:一个是国家对外语类人才的急需和高等院校外语类专业招生人数持续下降的“怪圈”,另一个是外语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两侧之间高校“招生难”和用人单位“招聘难”的“怪圈”。在英国,社

会各界普遍高度重视外语教育。2019年,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医学学会、皇家工程院和皇家学会联合发布《英国语言状况:行动计划》,建议协调各方力量,实施“国家语言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languages)。2020年,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又联合英国人文艺术研究协会、英国大中小学校长协会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英国大学联盟等组织发布《国家语言战略:教育和技能》(Towards a National Languages Strategy: Education and Skills)。在美国,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大学联盟发布《国防教育与创新倡议》(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Initiative),将外语教育提升至与STEM(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同等的地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于是在2015年成立“语言学习委员会”(Commission on Language Learning),启动美国语言能力调查工作。2017年,该委员会发布报告《美国的语言:加强面向21世纪的语言教育》(Americas Languages: Investing i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提出将外语教育置于与数学教育和英语教育同等的地位。然而,英美两国高校外语类专业招生数量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高校不得不撤销外语类专业。

类似的现象在我国也已出现。在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大批精通外语、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传播、国际组织和国别区域人才,但与此同时,高校外语类专业在招生和毕业生就业方面均出现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背景,但说明当前我国外语专业的改革和建设需花大力气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笔者认为,应对外语类专业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我国外语教育需精准对接“强国建设”对外语类人才之需,力促自“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转型以来的第二次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即构建中国自主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这一人才模式转型的宗旨是提升外语教育服务“国之所需”的能力;核心任务是构建中国自主外语教育知识体系;前提是推进外语教育多元化发展;标志是建设对人才培养目标具有良好支撑度的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系列教材。

中国自主外语教育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长期任务,就现在的课程体系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颠覆性的工作,需要外语界同仁认真思考、大胆创新,根据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重构目前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体系的重构既涉及外语类专业内部,也涉及外语类专业与其他专业的交叉融合。首先,外语类专业内部的商务英语、翻译和语言学专业与英语专业之间的区分度不够,特色不够鲜明。商务英语、翻译和语言学专业将相当一部分课时用于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势必削弱其专业性。语言技能的训练从一开始就应融入专业课程。其次,外语类专业要根据“国之所需”人才类型与传播学、外交学和政治学类专业深度交叉融合。同时,各外语类专业自身也应深入思考现有课程体系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例如,要培养合格的国际传播人才,各类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课程必不可少,而目前我国内地高校外语专业所开设写作课程多为Essay Writing,开设最基本的创意写作课程者

寥寥无几。相反,香港中文大学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不仅有 Creative Writing,还有 Writing Short Stories、Writing for the Stage 和 Writing for the Screen,也有 Advanced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外语专业改革与发展自身的小逻辑要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中国自主外语教育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以“国之所需”为出发点,这就决定了中国自主外语教育知识体系要打破现有知识体系的路径障碍,强调服务“国之所需”的能力。因此,中国自主外语教育知识体系必然强调学科的交融,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外语教育在内涵和外延上要不断突破现有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五大学科基础。外语专业唯有与时俱进,方能永葆生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看原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英语系的课程设置,其必修课程中除了“英国文学史”“英文名著选”“英国文学源流”“近代英美诗选”和“近代英美散文选”之外,还有“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化史”“欧洲文学史”“欧洲文学批评”;而选修课程中,除了各时期“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近代欧美小说”和“近代欧美戏剧”等外,还有“西洋哲学史”“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英美现代哲学”“法国现代哲学”和“德国现代哲学”等课程。这样的课程体系,是不是更强调“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呢?如果英语专业仅开设“英美文学”,而俄语专业和日语专业分别开设“俄罗斯文学”和“日本文学”,那我们培养目标中的“国际视野”何以体现?

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的兴衰对我国外语类专业改革与创新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外语教育应对所面临危机与挑战的根本出路是构建中国特色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而中国自主外语教育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颠覆性思维。

姜亚军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语专业分类卓越

姜亚军教授的论文《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的式微》是一个很好的区域国别研究范例,对我国外语类专业的课程设计、外语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所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再加上人工智能一日千里的发展,外语类专业到了总结、转型、再出发的一个关口,外语人需要达成自上而下进行外语教育改革的学术共识。听闻上海有些大学撤销了德语、日语等专业,这种做法其实不利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以及外语教育的发展。中国现在不是闭关自守,而是要继续改革开放,因为现在的经济内需已经饱和,我们不仅文化要走出去,经济、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都要走出去。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退群”,但我们还在积极拥抱全球化、促进全球化。无论是国际传播还是企业出海,外语都是载体和桥梁。我们不能被社会少数唱衰外语专业的声音所误导,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外语专业、外语学科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改革开放 40 年来,各高校设置的外语专业太多,外语专业招生的入口门槛太低,毕业生同质化倾向严重,导致目前外语专业出现“小才不断、大才难觅”的现象。实际上我国高端的外国通人才依然是供不应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高举外语发展的旗帜,另一方面要勇于改革自新。姜亚军教授(2025)提出的分层、分类培养非常必要,体现在招生、教师、课程、目标等方面。比如外国语大学中外语专业的培养方向、985 高校外语类 A+学科的培养方向、师范大学的外语专业的培养方向,特色类高校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应该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外国语大学承担着培养涉外人才的责任,包括研究类的人才和外国通的人才;具有外语类 A+学科的 985 高校要培养研究性人才,可以考虑本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师范类大学要保证中小学英语老师的培养规划,其招生要求、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各具特色;石油大学、财经大学、农业大学、理工科大学、海洋大学等行业高校,应该按学科需要分类培养外语人才。我们应该允许外语类专业课程的“五花八门”,要勇于把精读课、泛读课砍掉,把所有的阅读课变成用英文讲英语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地理等知识的通识课、特色课。所以说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建设任重道远。老师的角色也要发生改变,教师作为一个协调者、服务者,把“舞台”还给学生,这样的英语课才有趣味、有价值、有效益。我们要从培养“外语通”转变为培养“外国通”。

在课程设置上,人文通识类的课程、跨学科的课程、区域国别的课程就要代替传统的精读、泛读、听说课。对非师范类的外语专业生而言,专业课有没有必要从语音开始讲,用不用上很多的基础课?如果不是为了从事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那这类课程应该作通识课还是专业课?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涉外人才,包括国际传播、制造业、农业,甚至“网红”行业,这里有巨大的人才供给缺口。而外语专业毕业生从事涉外工作的有多少?他们不但人文素养不够,区域国别知识也欠缺。在目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的思考与研究中,鲜有外语人的声音。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区域国别知识,对这类国家大事、国际大事缺乏关注与思考。以广东某高校中美合作办学的本科生培养方案为例,学生一年级和四年级在国内高校学习、二三年级在美国学习。他们一年级的课程包括商科、学术、演讲等方面,为国外的学习搭建桥梁,而非语音、阅读等语言课。但国内多数外语专业的课程还从基础的音标开始,起点太低。高校应该从招生方面把好入口关,招收真正具有外语学习潜力的学生,这样才能进行课程深度改革。

随着课程的变化,外语专业的师资也要改变。过去的师资凭着自己专业的积累和技能来教外语,普遍缺乏诸如商科、管理学等跨学科的知识,这就需要已有的教师去补充该类知识,并招聘有跨学科背景的新教师加入外语教师队伍。外语教师要有自我革新、脱胎换骨的勇气。我们可以结合姜亚军教授的文章(2025)继续开展深入讨论,外语专业到底是不是式微,该如何凤凰涅槃,如何更新换代,如何成为国之重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时,校长说:“我们不但撤销文科,撤销外语专业,我们还要加大。”交大的外语学院打了一个翻身仗,从一个只做大学外语四六级教学的学院升级为 A+学科,且是全校人文学科中的唯一

A+。所以外语人、外语学科要自我革新,提高规格。

我们呼吁把外语学科置于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发展的大格局中,从“外语学习”向“用外语学习”转变;从“外语研究”向“外国研究”转变;从“知识取向”向“价值取向”转变;从“人文知识”向“人文精神”转变;从“以学生为中心”向“以学习为中心”转变;从“有趣教学”向“有效教学”转变,大刀阔斧,勇于改革,特色创新,分类卓越。

杨枫 上海交通大学

时代呼唤更好的外语教育

此次的“外国语文大家谈”(2025年6月5日)就中国外语专业的变革与发展问题展开讨论,非常有意义。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大国博弈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博弈、教育的博弈;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就是高质量的教育,包括高质量的外语教育。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几乎全球的外语专业发展都遇到了“堵点”,姜亚军教授的文章《英美高校外语类专业的式微》对英美国家近年外语专业的境况进行了梳理,我国部分高校撤减外语专业的现实也与英美的情况形成了某种照应。所以,姜亚军教授指出了“两个怪圈”现象,即国家需求大量的高质量外语人才,而高校的外语专业招生却出现持续减少;企事业单位需要外语人才但“招聘难”,而高等学校的外语专业却“招生难”。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外语教育或外语专业人才?如何才能培养出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外语人才?这些问题既是高校外语专业发展的问题,也关乎我国高等外语教育能否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外语人才支撑。因而,这次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不仅需要外语教育,而且需要更好的、更高质量的外语教育。这是国家的时代战略需求所决定的。几位教授在讨论中也完全认同这个观点。孙有中教授指出,我国的外语专业是国之重器,但外语专业确实需要改革,需要凤凰涅槃,我们也正在改革的路上。姜亚军教授认为,外语专业发展与变革需要颠覆性思维。杨枫教授提出,我们中国不仅仅是文化需要走出去,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走出去,因为我们已经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他们都讲得非常好,都是从国家战略需求来审视外语教育,从民族复兴伟业来审视外语教育。正是因为国家发展需要、民族复兴需要,所以我们的外语专业才有广阔的发展背景和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外老教授的回信中明确指出:“深化中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外语院校大有可为”,并强调外语院校要着力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国际视野和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①这是党和国家对新时代外语教育提出

① 中共中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2024-07-18. <http://cpc.people.com.cn/n1/2024/0805/c164113-40292631.html> 2025-06-05.

的新要求、赋予的新使命。作为外语人,我们应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拥抱全球化,积极应变,要从国家战略和历史使命的高度看待外语教育的必要性和价值性,要从服务民族复兴伟业的角度审视当今的外语教育变革,探寻变革的方式和路径。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被当下一些取消外语专业、削减外语专业招生人数等表面现象所迷惑,不再争论“要不要学外语”这样的伪命题,而是深入思考如何开展外语教育变革,深入思考如何才能办更好的外语教育,更好地培养国家急需的外语人才。

当然,办更好的外语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构建特色鲜明的或者具有中国标识的外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质量的外语专业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外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明确为什么学外语和学什么样的外语知识,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中国意识”或者“中国视角”。直白地讲,我们构建的外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符合“原创、自有、自用”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原则,更要以服务中国利益、有利于中国发展为根本宗旨。目前,社会上诟病外语教育“千校一面”、同质化严重。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造成部分人质疑外语教育的缘由。客观地讲,这一现象是存在的,我们也不必回避。当然,造成这种局面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由。如何破局?我们认为,从评价体系变革入手是正确的选项。评价一个专业的教育水平,师资力量、科研水平、人才培养、社会贡献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是,一所顶级的大学和一所省属普通师范院校的外语专业,其培养目标、规格、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教育部提出“破五唯”,就是主张分类卓越。分类卓越,就需要分类评价。把所有大学的外语专业都放在一个尺度去衡量,让所有大学都在人才称号、课题数量、论文数量、获奖数量等方面去比拼,显然不符合分类卓越的要求。顶级大学需要培养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国别研究专家,师范院校需要培养优秀的基础外语教育师资,而商贸院校需要培养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善于谈判沟通的涉外商务人才。因而,变革评价体系,创新评价标准,真正落实分类评价、分类卓越,是提升外语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国家急需外语人才的逻辑起点。

从专业建设来看,师资队伍重塑重组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的成败,关键是教师,强教必先强师。全国外语师资几十万,绝大部分都是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出生。外语专业要“凤凰涅槃”,首先要让师资队伍“凤凰涅槃”,要从教育情怀、知识结构、技术能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全方位对师资进行迭代升级。首先是以教育家精神引领师资队伍建设。只有格局高远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宽广国际视野和深厚家国情怀的外语人才。其次,教师知识结构更新与技术能力提级也是关键。传统外语专业培养出来的师资,在外语语言能力、外国文化知识方面具备优势,但在了解国情、理解文明互鉴以及技术赋能教育方面有短板,要加强培训。同时,还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跨学科组建外语专业教师团队。此外,专业教材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变革也是创新外语人才模式、提升外语教育质

量的重要维度。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展开了。

最后,再强调一下为什么新时代的中国需要更好的外语教育。当今世界,大部分的信息都是通过英语传播的,英语对我们而言是外语,但是对于英美澳加等国民而言是母语,所以中国人对外语的需求跟他们对外语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即使这样,他们对于西班牙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汉语、韩语等外语的教育也非常重视。不少发达国家都将外语教育视为关涉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出台了相关外语教育政策。质言之,国外一些高校削减外语专业、取消外语专业,不应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不掌握外语,我们根本无法了解世界,我们根本无法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卡脖子”的问题。中国正在大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无论对外贸易、国际传播,还是参与全球治理、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或是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都需要大批的外语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复合型外语人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外语人才,需要外语教育,而且需要更好的高质量的外语教育。学好外语、掌握外语是广大青年的有效报国路径。

董洪川 四川外国语大学

Reform and Advanc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in China's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SUN Youzhong JIANG Yajun YANG Feng DONG Hongchuan

Abstract: The once-in-a-centu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is accelerating, and major-power competition has placed higher demands on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t the tertiary level.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in universities are undergoing a "phoenix nirvana",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chieve this goal: first,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must boldly reform according to national priorities and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he focus must shift from cultivating "linguistic experts" to nurturing "country specialists", thereby serving China's long-term objective of approaching the central stage on the world platform. Second, the disciplinary substance of foreign languages must be deepened by expanding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and restructuring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Third,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should adopt a tiered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aining, while the disciplinary evaluation system must implement classification-based assessment. Fourth, faculty teams should be restructured and revitalized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commitment, knowledge base, technological proficiency,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pedagogical methods. In China's contex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erves as a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ions fo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For the youth of China,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opens a gateway to serving the nation.

Key words: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program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tiered approach to excellence; tiered approach to evaluation

责任编辑:龙丹